

1381年的 英國人民起義

希爾頓、法根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1381年的英國人民起義

希爾頓·法根著

瞿菊農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6年·北京

R. H. HILTON AND H. FAGAN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50

本書根據英國勞倫斯——章沙特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譯出

1381年的英國人民起義

〔英〕希爾頓、法根著

瞿菊農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6 $\frac{5}{8}$ ·字數119,000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7.00)元

統一書號 11002·63

“農奴不是天生的；他們之成為農奴是被征服的結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貴族不是由於財富亦不是由於出生而來的。一個靠背上背包而取得他的面包的人比一個無法無天的王子高貴得多。”

——本達爾(十四世紀布拉班人)

“札克雷的起義(一三五八年法國的農民起義)是一種制度崩潰的前奏，這種制度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必需而有用的，然而此時已成為社會不能忍受的負擔。封建秩序應該死亡：這裡就是它的死刑宣判書。”

——西門·盧斯(在其所著“札克雷”)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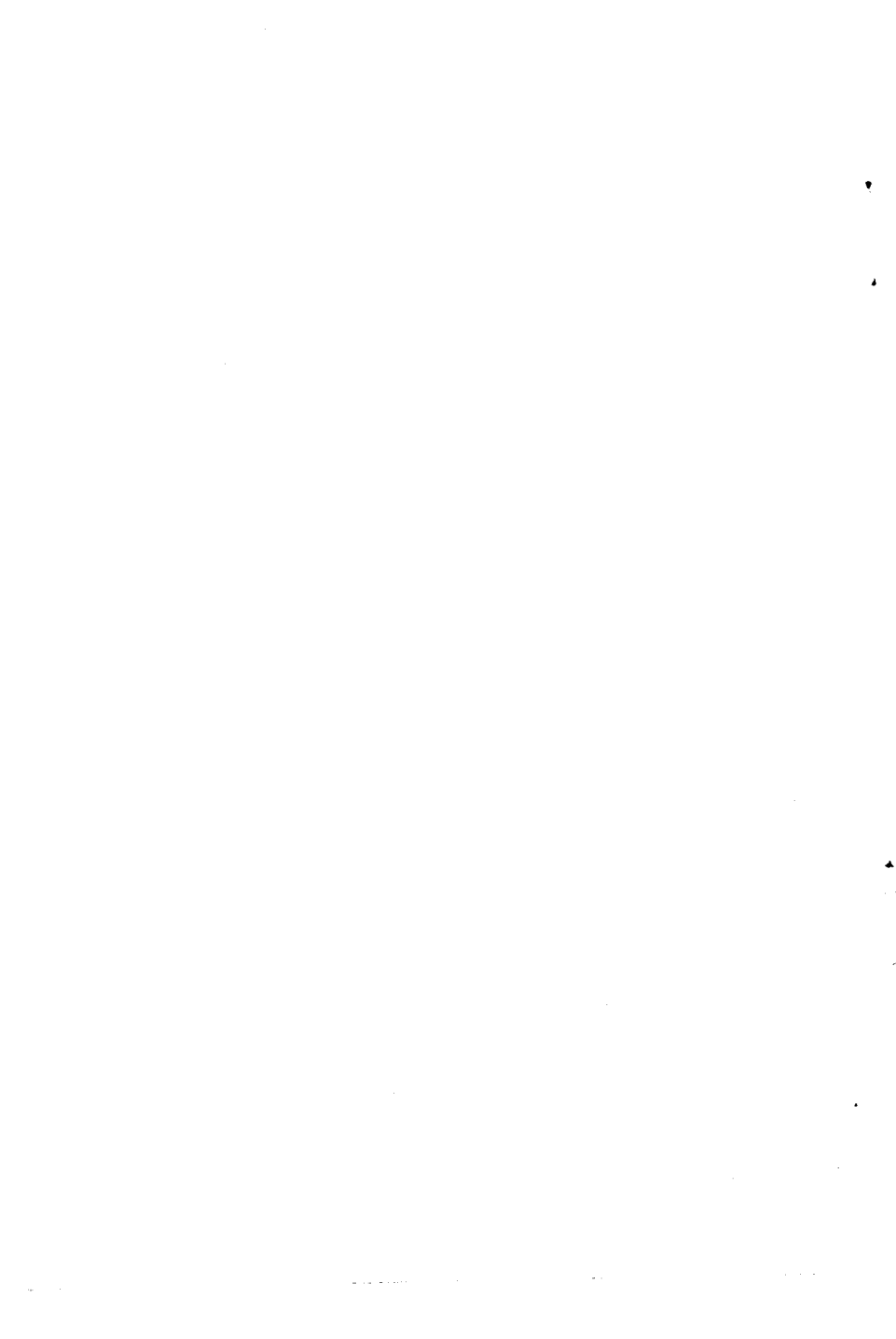
俄譯本序言·····	3
導言·····	19

第一部 起义的准备

第 一 章 封建社会:封建主与農民·····	21
第 二 章 起义前夕的英國政治·····	44
第 三 章 封建社会的思想(1) ·····	57
第 四 章 封建社会的思想(2) ·····	72

第二部 起 义

第 五 章 革命的爆發·····	95
第 六 章 勃拉克希茲与倫敦·····	111
第 七 章 兩個會議·····	125
第 八 章 邁尔恩德·····	131
第 九 章 各郡的起义·····	141
第 十 章 在斯密士菲尔德的謀殺·····	153
第十一章 國王反擊·····	177
第十二章 結局·····	191
若干重要史事紀年·····	199



俄譯本序言

一三八一年的英國人民起義是英國和其他國家資產階級史學家一再研究的對象。在這些研究中，俄國學者彼得魯舍夫斯基院士的著作是最好的。他所著的“華德·泰勒的起義”一書曾經出了四版。彼得魯舍夫斯基院士的這一巨著包括有以檔案研究為基礎而蒐集來的豐富的實際材料，並且直至現在還是每個研究英國中世紀史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參考書。但是該書是從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寫成的，在其後來的版本中反映出西方資產階級現代史學家（特別是道普施）反動觀點的影響，因而不能滿足渴望對一三八一年人民起義得到全面認識的蘇聯讀者的要求。兩位英國的史學家、戰前組成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團體的領導者——希爾頓和法根所著這部不大的著作是具有特別意義的。

希爾頓是“職業”的史學家，他是伯明翰大學的講師。法根是一個工人共產黨員、一個黨的工作者、一個宣傳家。一九三八年法根出版過一本通俗的小冊子，專敘一三八一年的起義，取名為“震撼英國的九天”。該書必然使英國工人回憶起英國人民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後來該書經過了不少的修改。其中加入了希爾頓所寫的引論，專論起義結果的最后一章也是希爾頓寫的，在出自法根手筆的敘述起義

过程的部分也做过許多修正和補充。本書於一九五〇年以这样的新版問世，現在譯成俄文介紹給苏联的讀者。

希尔頓和法根这部著作是打算給廣大讀者寫的。它不是一种專門研究作品，因而和彼得魯舍夫斯基院士所著的“華德·泰勒的起义”有所不同。本書寫得很通俗，其中並沒有史料旁征博引的博学味道，也沒有學術上的論爭，可是這沒有貶低它的科学价值。它是巨大研究工作的成果。特別是希尔頓所寫的那几章，他是一位英國十四、十五世紀土地歷史的卓越專家，是一位在这狹小的科学園地上曾經寫过很多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作品的作者。他為這本所寫的那几章是他旨在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闡明英國封建制度危机的研究作品的簡短概要。遺憾的是希尔頓和法根在其所著的這部書中並沒有对資產階級的史学著作展開論戰。

資產階級的歷史科学並沒有理解到封建制度是对抗性的社会結構，而且忽視“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階級斗争，便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①的这一事实，因而也就不能了解華德·泰勒起义的原因，而試圖把这种起义描寫成好像是違反英國所固有之歷史發展和平進程的和由當時英國農民所处特殊的非常条件下所引起的某种例外的現象。分析起义原因往往僅以說明这些条件为已足。同時某些似乎有別於大陸農民起义，特別是有別於法國的札克雷的特點，都被妄加到英國農民起义的身上。他們想把一三八一年的起

① “苏联共产党（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六三頁。

义看成不是一种被剝削人民羣众反对封建領主压迫者的起义，而是富裕農民要求使其法律地位符合其經濟独立地位的發動（屈勒味林、巴維尔在“劍桥中世紀史”中的說法）。永远敌視人民运动的現代英美的反動史学則把一三八一年的起义看成是“社会病”的征兆。依照美國反動社会学家賀敏斯的意見，这一“社会病”是起因於天主教威权的下降；賀敏斯說，無怪乎一三八一年既是農民起义的年代，而同時又是威克里夫立論反对基督教变体說的年代。

希尔頓与法根起而反对这些“主張”，因为这些主張的作家們企圖从英國史上抹煞社会斗争和被剝削羣众的革命發動，或者把革命發動看成一种罪惡。希尔頓和法根尖銳地反对英國資產階級作品中流行的把一三八一年的起义看作“英國歷史平穩而安靜的發展过程的不幸中断”的觀念。他們把这次起义看作一种具有全歐意义的事件，看作一种隨封建制度開始崩潰而起的籠罩於十四世紀歐洲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表現。他們把一三八一年的起义与中世紀英國及其他國家所一样具有的農民和封建領主間長久不息的階級斗争的許多事实相並列，把華德·泰勒的起义与歐洲其他國家大規模的人民运动相比拟。並且甚至可以和延展至十五、十六乃至十七世紀的运动相比。本書第一部指出農民起义是由封建經濟的發展过程，由政治的、思想的上層建筑的發展过程所引起的，而且只是日益尖銳的階級斗争的最鮮明的表現。

作者还在一个方面拋開了資產階級作品中所接受的傳

統。資產階級的作品經常有意地或無意地反映了那些永遠敵視勞動階級的編年史和官方文件等史料的觀點。作者站在被壓迫者的而非壓迫者的立場，企圖修正歷史的展望。他們認為資產階級著作上所採用的關於農民起義原因和歷史的分析是錯誤的，因為它的方法論有缺點，也因為現代的研究作品已經提出了許多新的為過去所未曾考慮到的事實。

難怪希爾頓和法根的書在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上不受歡迎，因為資產階級報在本書看到了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起義的“率直的嘗試”。

作者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沒有疑問，他們所寫的一三八一年起義的歷史與資產階級史學家對這同一論題所寫的是有顯著不同的。作者企圖對他們所敘述的事件進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這一研究作品中引用了許多新的為以前研究者所不知道的或被他們故意忽視了的材料。這特別表現在本書的第一部關於起義前的歷史。在這一部中作者（希爾頓）根據他自己的專門研究，證明了那往往演變成公開衝突的激烈的階級鬥爭至少從十三世紀以來已成為英國農村的特點，而農民起義只不過是這種鬥爭已達到最高度，但遠遠不會結束階級衝突的那個頂點而已。在這一方面，本書和彼得魯舍夫斯基的觀點是有分歧的，彼得魯舍夫斯基認為十三世紀是領主經濟和農民經濟的“社會和諧”時期，而階級鬥爭僅從十四世紀才開始，那時在“貨幣關係”發展的影響下封建地產開始瓦解。希爾頓因而也就駁斥了英美史學家的新近學說（例如巨大研究作品“十三

世紀的英國村民”的作者賀敏斯的說法)，這些史學家存心把十三世紀看做社會“平衡”的時期，看做封建領主和農民在教會道德和禮節的調節影響下在農村和平共處而“互相効勞”的時期。

本書的第一部有許多足以剖釋十四世紀時席卷英國整個封建經濟系統的深刻危機的有趣的資料——這是表現在強迫勞役制崩潰、封建領主經濟瓦解、地租制度發展、僱傭勞動制成長和“勞工法”產生的一種危機。也用新觀點來闡明在一三四八年至一三四九年籠罩英國的傳染性鼠疫的“黑死病”問題。希爾頓認為這個瘟疫及因之而起的人口減少在封建農奴經濟崩潰的過程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他認為這些由瘟疫所造成的災禍決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而是農民本身和農民經濟因極端剝削和窮困而趨於疲憊竭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這個觀點也被另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摩理士·鐸伯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一書中闡明過）。希爾頓在說明十四世紀的“勞工法”問題和政府對這問題所採取的階級政策中，也提出了許多新的說法。他十分正確的指出，政府的政策必然會擴大農民的政治視野。農民現在已不但把封建領主及其走狗看做敵人，而且也把封建國家和它的機構看做敵人了。他所提出的富農方面對“勞工法”態度的看法也是十分有意義的，這時候，富農已經以勞動力的僱主的身份出現了。

作者在分析農民起義的原因時，不僅（像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那樣）以分析土地關係為限而且對於城市（特別是倫

敦)的社会冲突,描繪出一个輪廓(虽然是十分粗略的),同時也說明了起义前那个時期的政治形势的特征——这些可以說是作者很大的功績。

作者對於百年战争原因的分析,沒有疑問,也是饒有意义的。作者不同意对这个战争的通常的現代化的說法,把它說是为了爭夺法蘭德斯的英國羊毛市場的战争,他強調百年战争的封建性質:那就是封建領主在國內喪失了擴大土地的收入的可能性,轉而企圖掠夺法國以为補償。如果說到商業利益,那末,英國对加斯科尼的商業的關心远在其对法蘭德斯的商業之上。作者在分析封建領主內部所發生的冲突時,也預先防止了現代化。他不把一二五九年至一二六五年的“封建貴族战争”看作是限制王权的斗争,而把它看作在十四、十五世紀繼續着和加深着的封建敌对集团的斗争。这个斗争是農民地位惡化的原因之一。当战争的發展过程对英國人不利,而战争掠夺品的輸入停止時,英國的封建領主就開始互相殘殺,並且或者直接依靠自己的一帮軍隊或則依靠國家机构來掠夺人民,把战争用費的重荷轉嫁給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身上。

作者的功績还表現在他們特別注意到作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态及其在基礎形成和鞏固中所起的作用。書中有些專章討論“封建社会的思想”——封建主和封建教会的觀點、封建的法律學說、封建思想体系和新兴貴族及新兴資產階級思想体系以及最后勞動羣众的思想体系之間的斗争——这是極有意义的,但在史料中很少得到反映的一个論

題。在勞動者的思想體系中，尽管缺乏史料，仍可从以後發生的情況看到日益鮮明地表現出來的戰鬥的與革命活動力的精神。

本書的第二部敘述農民起義本身的歷史。上面說過，這一部是另一作者法根所寫的，在文體和敘事特色上都和第一部大不相同。不像第一部那樣充滿着許多結論和概括，第二部主要是以生動而美麗的文筆來刻繪事實。作者試圖以被剝削者的觀點去解說農民起義的歷史，而非如沾染着階級色彩的史料以及追隨其後的資產階級史學家那樣以剝削者的觀點去解說起義的歷史，所以，自然的他不能盡信史料所提供的證據而要對之作出自己的解釋。很遺憾的，在這簡要而通俗的敘述中幾乎全部沒有應用以前的批判性的和創造性的著作，因此我們也就很難來觀察第二部的效果了。作者企圖以深刻地深入到那指導起義者和他們敵手行動的動機中來補充史料。同時他竭力尽可能地將這個遙遠的事件與現代重大的問題聯繫起來。在這方面他的舊作：“震撼英國的九天”和新作：“一三八一年的英國人民起義”都是具有深刻意義的。本書的使命是喚起英國人民回憶自己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在作者看來，約翰·勃爾就是這些傳統的最先的代表者之一。作者把起義的農民看作社會平等主義派和憲章運動者的先驅。這是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意圖把問題現實化，然而却難免有現代化的危險了。

法根到處強調起義農民隊伍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強調他們有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違法的意圖。同時他提到農民

的勇敢，提到他們在起義的最后一幕的頑強抵抗。他把農民的溫良與忠誠和統治階級的背信、殘酷，他們的存心作任何欺騙和奸險，他們對起義者的兇惡和卑鄙的屠殺來作對比。他把法官羅伯特·脫雷西利安看成一長串“英國司法屠夫”名單上的第一人。不過，如果以中世紀的尺度來衡量的話，他以為就全部來說，這個鎮壓似乎還不算是最殘酷的。迫害迅速地停止了，原因是害怕引起新的起義，同時也是顧慮到會缺少封建經濟所必需的勞動力。在我們看來，鎮壓仍然是十分殘暴的，而且在人民中長久地留下惡劣的回憶。

本書最后一章是希爾頓寫的。這裡，他強調這次農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對英國封建制度的崩潰卻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起義是失敗了，可是農村的騷動並沒有停止。不過封建制度的崩潰並不是農民的勝利。作者仔細的分析了農民為什麼不能勝利的原因。

作者關於農民分化的見解，關於從農民中分化出英國農村資本主義肇基的代表者——農村的資產階級和小鄉紳的見解，是十分有意義的。他對於十五世紀封建集團的鬥爭與都鐸王朝專制政體的興起所作的簡短的分析都具有許多有意義的意見。希爾頓在反映最近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英國專制政體的階級性質所作的辯論的成果時，強調指出都鐸王朝專制政體的封建性質，並且認為鎮壓農民起義便是專制政體主要的社會職能，雖則作者對於決定英國專制政體形成的條件的闡明還是遠遠不夠的。

希尔頓和法根所著的這部書對於闡明一三八一年的農民起義問題，以及封建時期農民起義的一般問題是重要的一个步驟，可是本書同時也有一些值得我們提出討論的見解。本書的結構不是沒有缺點的。我們覺得兩位作者還沒有能够把他們的作品融和为一个完整的整體，而希尔頓所寫的各章在文体上和性質上和法根所寫的各章都有顯著的不同。上面我們已經提出了与這些問題有關的意見。

如上所述，希尔頓是十四、十五世紀英國土地史方面的一位重要的專家。然而他的某些解釋，在我們看來仍然是值得爭論的。特別是他追隨新近某些資產階級史學家之后，將十三世紀的“繁榮”言过其实、这个首先由美國學者格拉斯应用於十三世紀歷史因而流行起來的說法，所指的是當時封建農奴制地產及其強制勞役制度大見活躍——正如某些英美作家所說的那樣，這是符合於日益成長的要求和價格的高漲，符合於“行市的上升”的一种活躍。与此相關聯的是勞役義務的增加，領主耕地的擴大，農奴經濟的“合理化”和精打細算。所有這些現象在十三世紀都可看到，但資產階級的學者們過份誇張了它們的意義，他們不願意看到封建地產的自然經濟基礎，而且有意把它看做“資本主義”的，或至少是“類似資本主義”的企業。事實上，封建農奴制地產適應市場需求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由於農奴勞動生產率低，一方面也由於農民的反抗日益增強，像希尔頓所正確指出的那樣。

關於封建地產經濟的商品性的增長及勞役義務制的增

長的史料証据，可採用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史料常常將轉移到同一佔有者的另一地產上去的產品移轉，也記入在出售欄中；記載在地產文件中的勞役義務很少要求全部而部分代之以貨幣地租。像我的過去著作^①所指出的那樣，在十三世紀雖然勞役義務是部分地增加了，但貨幣地租在英國已成了佔統治的形態。那些證明十三世紀農業產品增加、特別是市場產品增加的統計數字，在我看來，是毫無根據的。顯而易見，農民（農奴和很多的自由農民）與小地主在供應那正在發展的國內市場上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十三世紀已經存在着許多擁有小量土地的農民，並且除了勞役租制的勞動外，這些接受貨幣或實物工資的“小農夫”的勞動也受到剝削。

像某些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史學家一樣（特別是波茨敦），希爾頓也傾向於把作為“繁榮”世紀的十三世紀和作為衰落世紀的人口減少，市場萎縮，經濟危機的十四世紀來相對照——而所有這些都在說明農奴勞役義務制度經濟的沒落。如上所述，希爾頓認為這一切現象並不是上帝所賜的偶然事件，而是“封建強迫勞動的過度緊張”及其所引起的農民肉體和經濟的過度消耗的直接結果（但是，同時，在希爾頓的作品中，一三四八年至一三四九年黑死病仍居中心地位）。沒有疑問，希爾頓的這些理解是有許多真理的。甚至不會誇大被剝削階級的災難的資產階級學者，也不能不

① 特別參閱柯斯銘斯基著：“英國土地史的研究”，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四章。

承認英國農民在封建制度地產極發展時所受的悲慘遭遇（郭魯敦，賀敏斯，尼爾遜）。但是絲毫不能同意把十三世紀“廣大羣衆到處都是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說成是由於人口过剩所引起的。它是由封建剝削的加強而引起的。此外，對於長期的人口減少，特別是英國在十四、十五世紀的經濟衰落，也說得不够。農奴勞役義務制地產的衰落不能與整個經濟的衰落混為一談。封建地產制度的衰落並不是由人口減少，由經濟衰落所引起，而是由生產力的提高，首先是由使農民擺脫勞役義務而過渡到確定的貨幣地租及日益與市場發生密切關係的農民經濟生產率的提高所引起的。剝削僱傭勞動而與市場發生密切關係的小地產所起的作用也愈來愈大。糧價的低落並不意味着市場的收縮，而意味着谷物經濟生產率的增加。以剝削生產率很低的農奴勞動為基礎的封建大地產經不起農民和小地主經濟的競爭；對農民實施交付貨幣地租制，對於封建大地產而言，比起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經濟的產品更為有利。正如希爾頓所正確地指出的另一種力量——農民的反抗力，也推動了封建經濟走向這同一的方向。依照希爾頓的意見，這一力量自十三世紀初葉以來不斷地發生作用。我們以為，在時間上，這一力量起作用還要早得很多，從封建剝削的初期就發生了。

隨着封建領主要求的增長和農民轉變為商品生產者趨勢的增加而日益高漲的農民反抗力，更加抑止了農奴勞役義務制度的作用。封建領主企圖過渡到僱傭勞動制並沒有成功，而這與其說是由於人口減少，不如說是由於以強迫利